

“文化定型”与“跨文化交际悖论”

北京大学 高一虹

摘要: 本文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讨论“文化定型”的种种特征,并提出“跨文化交际悖论”这一概念,指出从事文化比较的学者和教师面临的矛盾:要促进理解和交流,就要概括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的定型又可能妨碍人类各民族之间的沟通。文章就悖论的解决提出了看法和教学建议。

关键词: 文化定型,跨文化交际悖论

1. 文化定型

“定型”(stereotype,亦有译“刻板印象”)是政治评论家 W. Lippmann 在《大众舆论》(1922)一书中首先采用的术语,指的是人们对另一群体成员所持有的简单化看法。其基本假设是:属于一个群体(民族、宗教、性别等)的成员具有类似的行为和态度。定型有“自定型”和“他定型”之分,前者是某群体关于自己的定型,后者则是关于其他群体的定型;一般所讲的定型是后者。“文化定型”在此文中指人们对另一民族或国家的成员的简单化看法,例如“保守的英国人”、“浪漫的意大利人”,等等。

1.1 定型的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

Lippmann 最初是将定型作为消极概念使用的,他认为定型是错误的、非理性的。但后来的社会心理学家则更多地将定型作为一个中性概念,因为他们发现,定型是一种普遍的、不可避免的人类认知方式。

世界是极其复杂的。要在本来混沌无序的世界中认识和把握难以准确定义其特征的种种现象,就必须将其简化,用概念分类、排列和组合进一个有序的框架中。如此,“原型”(prototype)被用来概括不同类的物质(见 E. Rosoch 的研究),“定型”用来概括不同类的人。对日常生活中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各种群体,大到“男人”与“女人”、“商人”与“文

人”,小到“国营商店服务员”与“个体户”、“左撇子”与“右撇子”,我们都有一些相当稳固的定型,或曰“典型形象”。这些定型可以帮助我们加速信息加工过程,以应付复杂的局面,在缺乏个体信息的情况下效果尤其明显。例如,一位外语教师为了迅速了解一个班的学生,可能在初次接触时使用“男生”与“女生”、“文科生”与“理科生”、“农村生”与“城市生”、“南方生”与“北方生”等类别概念,以及与类别相关的种种定型,如女生比男生更“善于口头表达”,理科生比文科生更“擅长逻辑推理”,农村生比城市生更“用功”也更“容易自卑”,某些省份的南方学生“分不清[l]与[n]”,等等。这些概括未必正确,也未必适用于每一个体,甚至带有强烈的个人偏见,但它会使教师减少脑力负荷,在短时间内对相当数量的学生留下印象,因而也很实用。可见,定型并不是“非理性的”,它同“原型”一样,是人类在应付复杂的外部世界时普遍使用的一种基本认知策略。

1.2 定型的稳定性与变化性

定型有其心理学根源,但大多受到社会传统和规范直接影响。现有研究表明,文化定型有某种跨时间和地区的稳定性,有些文化群体在世界上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有着十分相似的定型。但另一方面,它又容易受到国际政治关系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产

生变化。下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生被试分别于1933、1951和1967年对部分文化群体的定型(Brown, 1986: 589)。在实验中,被试需根据他们对指定文化群体的印象,从一长串品质形容词中选出一些“最典型的”。表中按顺序列出了选择频率最高的5个品质形容词,例如1933年有79%的被试认为犹太人“精明”(shrewd),49%认为他们“唯利是图”(mercenary)。

普林斯顿大学学生被试对不同文化群体的定型

文化群体	1933年	1951年	1967年
美国人	勤奋	追求物质享受	追求物质享受
	聪明	聪明	雄心勃勃
	追求物质享受	勤奋	追求享乐
	雄心勃勃	追求享乐	勤奋
	进取心强	个人主义	循规蹈矩
日本人	聪明	善于摹仿	勤奋
	勤奋	狡猾	雄心勃勃
	进取心强	极端的	讲效率
	精明	民族主义	聪明
	狡猾	奸诈	进取心强
犹太人	精明	精明	雄心勃勃
	唯利是图	聪明	追求物质享受
	勤奋	勤奋	聪明
	贪婪	唯利是图	勤奋
	聪明	雄心勃勃	精明
黑人	迷信	迷信	擅长音乐
	懒惰	擅长音乐	无忧无虑
	无忧无虑	懒惰	懒惰
	无知	无知	追求享乐
	擅长音乐	追求享乐	好夸张

表中显示的总体情况是,在跨度三十多年的三次测试中,被试对每一群体所作的定型有相当大的一致性(日本除外),三组形容词的重合率很高,只是排列顺序略有不同。三次定型之中,又以前两次的结果更为接近。不过,测试结果也显示了一定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对日本人的定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3年,美国被试对日本人的主要定型是“聪明”、“勤奋”和“进取心强”,而在二次大战(特别是珍珠港事件)结束不久的1951年,他们的定型则明显地增加了贬义成分,多

了“奸诈”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内容。在战争结束二十多年后的1967年,日本人的定型又与战前表现出很大相似性,恢复了“勤奋”、“聪明”和“进取心强”,增添了“雄心勃勃”和“讲效率”。可见,战争时期敌对情绪的建立以及后来的消除对定型有重要作用。对印度大学生的定型测试(Sinha & Upadhyaya, 1960)也反映了国际政治关系变动的影 响。1959年2月,一组印度大学生接受了对八个国家的文化定型测验,此时他们对中国人的定型是“有艺术气质”、“虔诚”、“勤奋”、“友好”和“进取心强”。相距短短十个月,也就是中印边界争端发生后的同年12月,当他们进行第二次测验时,其它七个文化群体的定型无变化,而中国人的定型变为“富有侵略性”、“富有威胁性”、“好欺骗”、“自私”和“战争贩子”,只是“艺术气质”一项依然如旧。

除国际政治关系之外,文化定型还可能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变化。例如,表中普林斯顿大学学生1951和1967年的文化定型比以前较少自定型高于他定型的倾向,且有部分学生认为此种实验“荒谬”而拒绝参加。Brown认为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大学生对于文化定型、民族中心主义等概念已经有较敏感的意识,因而尽量避免“褒己贬人”。

1.3 定型的弊端

定型的弊端之一是夸大群体差异,忽略个体差异。对于群体特征的“典型概括”不免是“过分概括”,其极端形式是,群体之间完全不等;群体内部的个体完全相等,也就是:

中国人甲=中国人乙=中国人丙

美国人A=美国人B=美国人C

定型思维模式顽固的人习惯以群体的概括取代对个体的具体观察、分析和判断。他们似乎患上了某种眼疾,看不见千差万别的、有血有肉有个性的张三、李四、王五或者Peter, Tom, John, 只看见千人一面的形象:凡中国人一律内向、保守,凡中国女人必是三

寸金莲;凡美国人一律认钱不认人;凡意大利人一律浪漫而且歌喉嘹亮,等等。说来荒谬可笑,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却常常是这样用文化定型来给人贴上固定标签的。笔者有一朋友,是位年轻活泼的女外语教师。一次一位西方学者要求在她的课堂录相,说是要进行教学模式的跨文化比较。课上到一半,这位西方观察者喊住了教师并将她拉到一边说,你的课这样活跃,好象不是中国人的上法。女教师气愤地回答:我一向这样上课,依你看中国人的课是怎么个上法?你既然已经知道中国教师怎样教课,就请不要录相了。

定型的严重弊端是它常与“本群体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有密切联系。所谓本群体中心主义,即以个人所属群体为中心看问题,抬高本群体,歧视他群体,体现在民族之间便是“民族中心主义”。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民族间对立的形成需有一个社会条件和两个心理过程,社会条件即不平等的物质或资源分配,心理过程即文化定型和民族中心主义。文化定型与民族中心主义的不同点在于,定型似侧重“描述”而非“评价”,而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则会导致更多“评价”,表现为对他民族的偏见和歧视。关于群体对立的研究认为,作为认知成分的定位、作为情感成分的偏见以及作为行为成分的歧视共同构成群体间的对立。这几个构成因素虽有区别,却也有密切联系。特别是,由于语言是人的创造,定型过程中的“描述”与“评价”概念、“认知”与“情感”因素往往难以分清,特征描述本身蕴涵着褒贬评价和好恶选择,甚至一定程度的行为倾向。例如,上表中美国白人大学生被试对黑人的定型主要有“迷信”、“懒惰”、“无忧无虑”、“无知”、“追求享受”和“擅长音乐”,这其中除音乐一项外,“迷信”、“懒惰”、“无知”都有明显贬义,而“无忧无虑”(happy-go-lucky)、“追求享受”(pleasure-loving)当与“无知”联系在一起时也含有相当

的贬义。又如,W. Lambert 曾于七十年代在加拿大的一个双语地区用“配对变语”(matched guise)方法做过调查,请一名双语者分别用法语和英语朗读同一段书面材料,并将录音放给被试听,请他们判断说话人的特征。结果以英语为母语的被试普遍认为,说英语的人比说法语的人长得漂亮、个子高、聪明、可靠、和善、进取心强、个性鲜明。这一“描述”结果充分表现出他们对讲法语的人的偏见。在对性别定型的研究中,Fidell (1970)、Rosen 和 Jerdee (1974) 等人发现,定型与行为倾向有密切联系。对于研究者虚构的、除性别之外所有信息完全相同的个人简历,作为大学心理系主任、公司经理的被试在“推荐录用”问题上明显地表现出歧视妇女的倾向(Brown,1986:600-601)。

本群体中心主义的产生条件是什么? Sherif 等人(1961)在著名的“罗伯期洞穴实验”中发现,只要将一群互不相识的人分为两组并使其竞争,就会产生本群体中心主义。该实验中群体对立后果的严重程度超出预料之外,以至于研究者几乎无法控制激烈的对立局面。然而Tajfel 等人(1971)的“最小分组实验”(minimal group experiment)结果进而表明,竞争并不是必要条件。只要将人们随机编入贴上某种标签的小组,就足以导致本群体中心主义的产生。也就是说,分类(categorization)本身即本群体中心主义的最低条件。由此可见,文化定型的思维方式有可能助长民族中心主义,甚至助长或强化文化之间的对立。

2. 跨文化交际悖论

2.1 什么是跨文化交际悖论

近年来,文化差异在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跨文化交际学”这门新兴学科也因而引起了广泛兴趣。根据Porter 的定义,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是“对社会事物和事件看法方面的文化差异。只有了解和理解了这些文化因素的差异,并且具有

成功地与他文化成员交流的真诚愿望,才能最大限度地克服这种看法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胡文仲,1990:6)。可见,研究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是提高人们对于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

作为从事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学者或者语言教师,我们面临这样一个矛盾:为了帮助不同文化的人们相互了解,就必须概括文化差异,必然要建立某种文化定型;然而这些定型对于差异的“过分概括”或“标签化”又可能人为地制造屏障,妨碍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一面是架设桥梁,沟通文化的使命,另一面是构筑壁垒,隔绝文化的危险,这一“桥”与“墙”、文化定型之打破与建立的矛盾,我将它称为“跨文化交际悖论”(paradox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语言相对论的倡导者萨丕尔曾说过,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语言(the word)是钥匙,也是桎梏。这一悖论不仅适用于孤立的词或概念,而且适用于更广意义上的概括:一种认识、一个理论、一种思维方法。在这个博大、复杂、混沌的宇宙中,掌握了一种概括的方式,就向把握世界和命运前进了一步,向自由前进了一步。然而同时,这种概括的方式又会淡化、遮蔽或完全掩盖事物的其它方面。文化定型就是这样一种概括。有志从事文化比较、文化交流的学者在履行义务时若审视一下便会发现,我们精心铸造并传递给他人的,可能既是一把开启认识大门的钥匙,又是一副束缚思想的桎梏。

2.2 悖论的表现及背景

在跨文化交际学的经典著作中,文化定型的破除与建立之间的矛盾随处可见。仅以《跨文化交际学选读》(胡文仲,1990)收入的文章为例。一方面,文章的作者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文化定型,如Porter指出:“定型会使我们相信,所有爱尔兰人都是红头发、急脾气,所有日本人都个子矮、龅牙、狡猾,所有犹太人都精明而贪婪,所有黑人都迷信而懒惰。

虽然这些概括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它们并不正确!”另一方面,他又建立了一大批文化定型:Hall认为美国人属“单向记时制”类型,拉丁美洲和中东人属“多向记时制”类型,Norton认为朝鲜人的写作和思维模式是从个别到一般,美国人是从一般到个别;Okabe认为日本人重视人的资历、性别和家庭背景,美国人强调人的智慧、能力和性格;Yousef认为美国文化约束力小,中东文化约束力大;许烺光认为,美国家庭中最重要的是夫妻关系,中国家庭中最重要的是父子关系,并且因而具有一系列特点:包办婚姻、父母与成年的儿子生活在一起、孩子听命于长辈、父母死后儿子要供其牌位;Jensen认为,美国人鼓励儿童参与家庭事物的讨论和决策过程,而在亚洲,“儿童从来不准公开表达与父母或兄姊不同的意见”。

在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语言文化理论研究的热潮中,文化定型问题也屡屡出现并引起争鸣。例如,季羨林先生(1991)提出“河东河西”之说,认为西方文化以分析性思维为特征,东方文化以综合性思维为特征。到了下一世纪,以分析为特征的“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以综合为特征的“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又如,申小龙(1991)提出,汉语句法结构和汉族人的思维方式是“散点视”,西方的句法结构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焦点视”:汉语的句子是按“心理时间”铺排的,西方语言的句子是据“物理空间”组织的。中西语言和思维模式差异极大,无法“通约”。这些观点引起了热烈讨论和广泛争鸣。一些支持者认为,这种宏观的概括很深刻,但也有西方学者批评说,此类概括反映的不是语言和文化事实,而是研究者本人“爱国主义”的研究动机和闭关自守的文化心态(McDonald, 1993;参看高一虹,1993)。

在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教学实践中,民族中心主义的他文化定型也不罕见,其表现往往不单是抽象的概括,而且有定型指导下的

某些具体现象的片面描述。美国的亚洲协会曾于七十年代调查了美国50个州的中小学社科教材,对306篇有关亚洲的课文进行分析(Smith and Luce, 1979:141—172),结果发现,76%的课文采用了西方中心的视角,56%以此视角为唯一视角。这些课文普遍存在以下倾向:将现代化混同于西化;将亚洲文化描绘成神秘、怪诞、不可思议的;按西方标准描写和褒贬亚洲文化;侧重暴露阴暗面,忽略光明面。下面是几段课文实例:

“在非洲和亚洲,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在小茅屋中,这些茅屋远没有欧洲中世纪早期欧洲的茅屋舒适。这些亚、非人无法享受任何电力和煤气带来的生活方便。”

“大多数印度尼西亚村民的家中没有电,因而也无法享受收音机或电视带来的娱乐。他们也没有书籍杂志阅读。”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普通中国人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以维持健康,很多人甚至没有足够的食物以维持生命。”

回想一下七十年代及以前我国教材和大众媒介对西方国家的描述,又何尝不是充满了“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定型,以及此定型浇铸出的具体故事:

在我国目前的外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文化定型多体现于对日常交际习俗的概括。在大量著述中可以见到如下的对比:

	中国	英美国家
招呼语	吃过了吗?	How are you?
对赞扬的反应	哪里,哪里。	Thank you.
谈话题材	年龄、婚姻、 工资、他人隐私	天气、运动
价值观念	枪打出头鸟	个人精神

类似的概括有时也会产生问题。有外国留学生抱怨说,他们将“吃过了吗?”当“‘How are you?’”广为使用,听话的中国人有时莫名其妙。中国人不是相信“民以食为天”吗,为什么问吃会不灵验?有些外籍教师在教学中大搞一言堂,当学生在教学评估中提出意见时,他们感到不可思议:你们中国学生不是

喜欢听老师讲,不喜欢自己讲吗?几年前笔者曾向一位美国教学专家学了一套教学技巧并用于中国课堂,后来根据教学体会撰文谈了对中美非语言交际技巧差异的看法。文章在美国发表时,编辑加了一条显然不很赞同的按语:该教学专家的行为不代表所有美国教师。

从以上方面的举例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大多数学者有着促进文化间理解和交流的真切愿望,但其努力结果有时却背离初衷,其中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其一,文化是多元而不是一元的。并非所有中国人在所有时间都用“吃了吗?”打招呼,并非所有美国教师都在课堂上手舞足蹈。其二,文化是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当今中国大城市家庭并非以包办婚姻为主流,以四代同堂为理想,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赞赏。其三,由定型而产生的行为可能造成“期待效应”,影响、诱导、强化对方的某种行为。如果教师期待学生沉默,学生很可能会放弃参与愿望。其四,“差异”与“优劣”仅一步之遥。如果不能摆脱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对差异的概括往往是不公正的,因而非但不能促进理解,反而会导致对立。

当代中国同时有着打破和建立文化定型的深厚土壤。近十几年来外国文化潮水般的涌入,使文化差异的概括成为当务之急。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外部世界基本上是无知的,“文化定型”不过是黑白两分的政治定型:一面是社会主义的无限光明,一面是资本主义的水深火热。改革开放将我们的门窗在瞬间打开,五彩缤纷的色彩猛然扑入视野,让人目不暇接。在旧的非黑即白定型被打破的同时,如何为新的颜色定位,将它们纳入一个有序的色谱之中,便成为每一位文化工作者乃至每一位公民亟待解决的认知问题。同时,在“蔚蓝色海洋文明”不断冲击“黄土地文明”的情况下,对于母语文化的反思和重新定位也成为当务之急。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双向开

放的时代,一个对话越来越多的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定型的破除、建立和更新活动自然十分频繁,跨文化交际悖论也自然表现得尤为突出。

既然任何定型的建立可能制造交际障碍,那么跨文化交际是否根本不可能?它是否就是一座“巴别塔”,人类各民族注定要在它的脚手架上徒劳地忙碌?

3. 出路所在

我们应采取的态度和可做的事有以下几点:

3.1 承认定型、建立定型、向定型挑战

首先,我们需对文化定型有一公正的态度。作为一种认知的心理过程,它是合理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在跨文化交际学领域为“定型”正名:它应是中性词而非贬义词。

在承认定型之存在的基础上,我们应大胆而谨慎地建立定型,进而向定型挑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今天人们对文化差异的认识不再象昨天那样肤浅,正是由于当初建立过许多相当幼稚的定型,而后又向这些定型提出挑战,将其分解,找出影响它的诸种复杂因素,从而建立新的概括方式,达到认识的深化。譬如,“西方的个人主义”与“东方的集体主义”这一二元对立的观念对认识中西价值观念的差异有一定作用,但不免过于简单。不断有学者对这一定型提出修正意见。

定型的建立与文化学习的不同阶段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对一种文化的了解可大略分为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三个阶段(R. G. Hanvey 将跨文化意识分为四个层次, H. Wurzel 将文化多元主义的建立分为七个阶段,均有相通之处)。当我们对它一无所知的时候,头脑中一片混沌;当我们对它知之甚少的时候,头脑中建立了一清二楚的文化定型,因而会有一种把握了世界全貌的满足感;当我们对它知之更多的时候,头脑中原本明朗的印象又会模糊起来,本来清晰的疆界会发生交叉、重叠,本来非黑即白的视野中会出现

层次丰富的一系列色彩。在从“无”到“有”的阶段,定型的建立尤为重要;在由浅入深的阶段,旧的、粗略的定型受到不断的挑战,更加细致和微妙的文化差异以及更深层次上的文化“通约”成为注意的中心。我国目前大多数外语学习者尚处于了解外国文化的初始阶段,文化定型尚嫌太少。然而在关心跨文化交际的人迅速增多,文化研究和教学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提出警惕文化定型的危害并非为时过早。

3.2 几种需培养的意识

为了在处理跨文化交际悖论的过程中将民族中心主义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在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和教学中似应注意培养以下几种意识:

立场意识。在对文化差异进行概括或使用他人的概括时,我们应对自己或其他研究者本人的视角以及可能具有的文化偏见具有清醒的意识。譬如,对研究者的国籍、专业领域以及研究特色要有所介绍,避免采用“根据专家的研究”这样笼统的、权威式的话语,使学生对处理的信息保持一定距离,有足够的思考空间。

观点的多元意识。在讨论一个问题时,我们应介绍尽可能多的观点和看法。例如,在进行语篇分析时,有的研究者认为,亚洲学生的作文和思维模式是从特殊到一般,而美国学生是从一般到特殊,而另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则完全相反。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观点可以刺激人的思维,以便独立探索。

方法意识。在介绍跨文化研究成果时,除结论之外还应描述研究的方法。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用不同方法、不同材料和不同被试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和结论。有了方法意识和知识,就多了一个评价标准和分析手段,在面对结果相互矛盾的研究时就不会感到十分困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鼓励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亲自做一做文化比较研究,并要求他们思考和写出自己所作研究的局限。

群体与个体信息相区别的意识。应注意观察个体特征,避免忽略个体信息,完全依赖文化的群体定型来做判断的倾向。定型的存在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而对定型的片面使用才是最应避免的。心理学的决策理论认为,在决策过程中个体信息和群体信息都有其作用。群体信息往往作为“基础概率”(base rate)出现。许多研究结果(如 Kahneman & Tversky, 1973)发现,当基础概率信息和有效个体信息同时出现并发生矛盾的时候,被试倾向于放弃基础概率而依赖个体信息。虽然这一注重个体信息的倾向并非所有人都一样,但经过有意识的训练,人们应该能够逐步形成和加强这种思维习惯。

描述与评价相区别的意识。应尽量将描述与评价、差异与优劣分开。在阅读文化比较文献时,可分别找出其中的“描述”和“评价”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是否具有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下面这段文字是描述性的:“西方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的是自然时空,而且特别偏重空间的自然真实性。……中国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的是心理时空,而且特别偏重于时间。”文中“自然时空”和“心理时空”这对概念并没有褒贬涵义。同一作者的另一段文字则是评价性的:“汉语语流中单位实体的弹性,使人很容易联想到中国毛笔的弹性。毛笔不象西方的油画刷子那么笨拙,不象西方的钢笔线条那样死板。……它吸墨快速,吐墨自由,既能运用笔锋,又能调遣笔肚,不妨也可偶用笔根。书写可按可提,出墨可贻可容,墨色可浓可淡,且在点画运动中灵活调节,尽兴地表现点画的粗细、润枯、方圆、浓淡、重轻、起伏、正侧,且因人而异,因笔而异。不象西方的硬笔,粗不得,细不得,润不得,枯不得,出墨如一,缺乏变化。”此段中有一系列关于两种语言的反义词、反义句型,评价性极为明显。

对评价暗含于描述之中的情况应予特别注意。例如, Miner 在《纳西里马人的拜身

仪式》(Smith and Luce, 1979)一文中,以一个人人类学家的叙述角度虚构了一幅“现代原始部落”的图画。我的一班英专本科学生初读此文之后,第一反应均为“太残忍了”、“太落后了”、“简直不能相信”。当他们最终意识到“纳西里马”(Nacirema)是“美国”的字母反拼,“牙巫”(holy mouth-man)即牙医、“神龛”(shrine)即厕所、“威严的 latipso 庙宇”即医院、“将头放入烤箱烘烤约一小时”即烫发、“将蘸上魔粉的一小撮野猪毛放入口中,做一系列程式化手势”即刷牙等等,才恍然明白了作者描述的正是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而且描写得很真实。为什么初读此文时并没有联想到自己的文化,而且觉得恐怖得难以置信?原因之一是,文中大量使用了“庙”、“巫术”、“礼仪”等与宗教迷信礼仪有关的“描述性”词汇和句子。由于现代社会赋予宗教迷信礼仪的价值非常消极,所以这些“纯描述”实际上已经操纵了读者的判断。我在教学中发现,此类对“描述性”语言的解构非常有利于学生文化意识和批判能力的培养。

4. 结语

在当今我国的文化比较研究、外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讨论“跨文化交际悖论”有重要意义。这一悖论反映了我们在认识世界与自我以及文化交流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深刻矛盾,即文化定型的打破与建立、民族中心主义的消除与强化、搭“桥”与砌“墙”、铸造“钥匙”与“桎梏”的矛盾。面对这一悖论,我们的态度是:建立定型,进而向定型挑战;指出墙的存在,而后拆墙建桥;打破桎梏,就会获得新的钥匙。

主要参考文献

- Brown, R. 1986.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ition). N. Y.: The Free Press.
-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3. On the psychology of predic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80:237-251.
- McDonald, E. 1993. The 'Chinese Cultural

- Linguistics' movement and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 new manifestation of *guoqing*? CSAA (conference Paper, Australia).
- Sherif, M. et al. 1961. *Intergroup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The Robbers Cave Experimen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Book Exchange.
- Sinha, A. K. P. & Upadhyaya, O. P. 1960.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the stereotyp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oward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during the Sino- Indian border disput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2: 31—39.
- Smith, E. C. & Luce, L. F. eds. 1979. *Toward Internationalism*. M. A.: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 Tajfel, H. et al. 1971.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intergroup behavio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 1—39.
- 高一虹, 1993, “西有汉无”与“西死汉活”——从反事实假设之争看跨文化比较的标准和方法。王德春、邱天河主编《英语百人百论》(下卷)。四川科技出版社。
- 胡文仲(编), 1990, 《跨文化交际学选读》(英文版)。湖南教育出版社。
- 季羨林, 1991, 再论东方文化。《群言》1991.5:13。
- 申小龙, 1991, 《中国句型文化》。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收稿日期: 1994年8月5日;
本刊修订稿, 1995年2月4日
- 通讯地址: 100871 北京大学英语系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在长沙成立

由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湖南大学、南京国际关系学院、青岛海洋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和中科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共同发起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1994年12月3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12月3日—6日在该会挂靠单位中南工业大学举行。湖南省政府等当地负责人到会祝贺, 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区、市的八十名正式代表出席会议, 七十一名研究生列席会议。筹委会主任刘重德教授致开幕词, 副主任萧立明教授作了研讨会的学术总结报告。

研讨会共收论文83篇, 其中46篇选入论文集, 将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研究会学术顾问赵世开先生到会作了题为“语言学现状与发展”的学术报告, 杨自俭教授作了关于“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的历程与前景”的报告。会上学术气氛浓厚, 与会者分别就英汉语宏观比较研究、英汉语微观比较研究、英汉互译研究、英汉文化比较研究四个课题进行切磋, 获益良多。

研究会特聘吕叔湘、柳无忌先生为名誉会长, 选出31人组成理事会, 刘重德为会长, 萧立明等为副会长。并建立英汉语比较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和中西文化对比三个专业委员会。

(本刊讯)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English grammar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y *Geoffrey Leech*, p.1

This lecture discusses three trends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nglish grammar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trends are: a) the grammatical trend towards an isolating language, b) the Americanization of English grammar, and c) the trend towards colloquial usage. The author also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orpus-based methods of studying English grammar.

The height of tongue position for vowels in IPA system, by *Feng Zheng*, p.7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following four topics: 1) what do the phonetic terms *close/open* refer to; the height of tongue position for vowels or the degree of mouth opening;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ight of tongue position and the degree of mouth opening; 3) the five patterns of classifying the height of tongue positions of vowels and the heights of English vowels; 4) auditory perception; the main criterion of vowel learning. The above mentioned issues are very important in both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A stylistic approach to Hemingway's *Soldier's Home*, by *Wu Bing*, p. 22

The paper presents a stylistic study of Hemingway's *Soldier's Home*. An analysis of the author's syntax, vocabulary, foregrounding devices, methods of thought presentation, and his dialogues shows how closely literary form is related to content. His style is not merely part of some literary experiment, but "the essential part of his attitude toward life".

Paradox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y *Gao Yihong*, p. 35

Researchers and educator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variably face a dilemma: in order to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cultural differences have to be generalized. However, as any "generalization" is actually an "over-generalization", categorization of such differences can well be cultural stereotyping, which hinders mutual understanding. Such a dilemma can be called "the paradox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present paper raises and discusses the issue by examining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Suggestions are also made as to the way out.

Sequence of development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grammar teaching, by *Jiang Zukang*, p.43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heory and research findings on sequence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Against this theoretical background, two textbooks were analyzed in terms of the order of grammatical features presented, which turned out to b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sequences of development found in some investigations.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teaching of grammatical features can be ordered so as to be congruent with the sequences which mark the natural process of learning.

Action research: A new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by *Wu Zongjie*, p.48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notion of action research in its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text and then presents a detailed program, which was developed in Zhejiang Teachers' University, to facilitate such practice in China. Action research is potentially beneficial to both pre-service teachers and in-service teachers and it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rriculum renewal of English teaching methodology in China.